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Nanjing Datushashi Yanjiu

(增订版)

上

张生 等著



凤凰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Nanjing Datushashi Yanjiu

(增订版)

张生 等 著

上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 张生著. — 增订版.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06-2292-0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南京大屠杀—研究
IV. ①K265.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9738号

- 书 名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订版)
著 者 张 生 等
责 任 编 辑 陈晓清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b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211523
开 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 张 60.5
字 数 1115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292-0
定 价 290.00元(全二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57572508)

国家社科基金“抗战时期中国受害者PTSD研究

——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为中心”（批准号：09BZS021）

江苏省优势学科基金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本书分工：

张 生,第一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十部分、第十一部分、第十三部分。全书主旨,全书统稿,全书注释重置和原始出处核定。

董为民,学术史,第三部分。

郭昭昭,第二部分。

王卫星,第六部分

姜良芹,第九部分。

严海建,第十二部分。

屈胜飞,第七部分。

王金静,第八部分。

全书照片由张生、董为民选辑。

蔡志鹏、刘宁、张梓晗输入本书文字。

序

张生同志和他弟子们的著作即将问世,有幸成为该书最早的读者,我首先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日本侵华战争中发生的南京大屠杀,至今已经过去了 75 周年。而对这一残暴事件的国际性的审判,也已经过去了 60 多年。但是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似乎仍不减当年,而围绕这一事件的讨论与争论,也构成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我们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视野的扩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化对这一事件的研究。这是在新的时期这一研究成果出版的重要意义。

在事件发生 75 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三个层面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研究,即: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法律案的南京大屠杀,和中国国民认知中的南京大屠杀。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有各种主体、各种角度、各种立场、各种用意、各种载体的记录,它们之间的相互映照,显示出各自的说服力和缺憾。在文献渐近穷尽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出的核心事实是:1937 年 12 月,南京被日军占领后,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世界近代史上亦为罕见的惨剧。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日军以各种理由加以戕害,南京十数年建设的成果毁于一旦,影响及于今日。

在基本事实的层面,我们看到: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及其激发的全民战争狂热;日本战争战略的变迁;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王等扩大战争、膺惩中国的决心;日本外交人员与军方的一致与分歧;日本政府和军部内部的不同考量;各种层级的“屠杀令”;日军中弥漫的对中国人的蔑视和报复心理;乃至日军官兵在屠杀中的不同态度等等,一一呈现。国民政府持久抗战战略及其在局部的反复、错误;南京卫戍军的顽强与雪崩式溃退;南京居民的撤退、留守,乃至“改朝换代”心理;中国人苦难中的沉默、反抗与逆来顺受、苟且,甚至伤害同胞并存;市民生命财产遭受的巨大伤害与顽强的生命力;社区的破坏与重建;“不信青史尽成灰”的操守与政治性暧昧;汉奸、伪政权浮出台面,及其复杂角色等等,次第展开。西方人士留守南京、看护南京的动机;西方国家政

府基于国家利益在大屠杀期间的反应;民间意见与官方态度的分歧;西方人士与日方交涉的过程和策略;“安全区”的运行及其功能;西方人士与中国民众的互动;西方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消息的传播;西方人士在南京的存在对日军占领模式、殖民模式的影响等等,均明晰可见。所有这些,构成了战争前后南京的全息图景。

严酷的史实甚至超过了任何想象:在进出南京的交通要道挹江门,中国人的尸体堆到几英尺高,日军的卡车来回碾压,噗噗地冒出血水;仅佐佐木部队就屠杀战俘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个日军中队长也能带领屠杀1300人;密布南京的水塘里扔满了尸体,日军官兵和中国居民都得饮用被染红的脏水;被害中国官兵身上的现金被搜集、流通于南京,称为“臭票”……上至70多岁、下至六七岁的妇女、女孩被普遍侮辱,甚至国际安全区官员的女眷、从事医疗救助的护士也不例外,仅1937年12月16日一个夜晚,金陵大学及附近即有1000余名妇女被强奸;日军性暴力多为集体行为,在光天化日或被害者亲人面前进行;日军性暴力伴随杀害,并造成性病爆发,被害妇女怀孕、意外生育,以及长期遭受“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等病痛折磨;“慰安妇”广告堂而皇之张贴于南京闹市区,有妇女被数百次强奸……有组织的抢劫和焚烧,造成南京地区巨量财产损失,仅就5800多户的不完全统计,损失即达1.6亿元法币(战前币值);日军官兵收获巨大,有人每月竟能汇回国内上千日元;伪自治委员会首脑、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等,亦在被洗劫之列,日军抢劫之后,怂恿、默许中国贫苦妇孺进行偷盗,掩盖自身罪行;南京地区的铜铁等金属当时即作为战争物资被运回日本,文物书籍等自难幸免……日军操纵下的公开贩毒、销售,使南京毒品泛滥,烟馆等遍地开花,虽在西方人士目击下亦不避讳,每月盈利达数百万元。

大屠杀非惟中西人士熟知,即使日军官兵,亦在其日记、书信中详加描写,甚至在中国人头颅与被害妇女的裸身前拍摄照片炫耀其“勇武”。日方高层当然也心知肚明,所以,日本艺妓、女演员等在大屠杀期间即被组织到南京,拍摄她们安抚中国孩子的和美照片;珍馐美味运到南京,招待西方在宁人士;更有日军士兵驮背中国大娘、帮中国居民担水等“杰作”问世,企图扭转在国际社会中传播的日军残暴形象。

当然,史实中亦有悖论式事实:日军为引导南京居民离开西方人士的庇护,在安全区外免费发粮;个别日军官兵与西方人士相处良好,参加礼拜,赠送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救助中国居民的个案;个别宪兵,因看守难民营得到西方人士好评;南京日军警备部队的军纪也有程度上的差别。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本体是宏大、多面的,而作为法律案,必须在纷繁复杂的头绪中厘清因果关系,找出责任人,裁定其应负责任。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依据国际法和当时中国的国内法,以对谷寿夫审判和判决为中心,确定谷寿夫及

会攻南京之日军将领对屠杀负责。对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的审判,则确定战争中屠杀战俘及非战斗人员的犯罪性质。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依据国际法和美国法庭一般规则,围绕松井石根明知南京大屠杀发生、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的渎职行为,明确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链体系和事件性质。两场审判的效力,均为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中加以承认,也是今天整个国际社会看待南京大屠杀的基本立场所在。

审判唤起了集体记忆,亦引发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参与。判决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南京居民受到的伤害,伸张了正义。但两场审判均在不同程度上留有缺憾和后遗症。特别是东京审判,由于政治考量、资料搜集不够充分等原因,未能全面、彻底厘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和战犯责任,其中辩护方的证据和质证思路,竟成为后来日本右翼企图翻案的思想源泉。

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已经 75 周年了,中国国民对其认识不断变化、演进。1945 年,蒋介石核定日本战犯时,将“政治负责部分”如近卫文麿等 41 人“一律删除”;“军事负责者”等“亦一律免除”,其中包括松井石根;仅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谷寿夫等“特务工作之恶贯满盈者为主”(蒋介石 1945 年 10 月 14 日日记)。其不问究竟、条理不明的“以德报怨”政策,主导了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清算思路。南京审判、东京审判中,中方准备工作之粗疏,参与过程之马虎,应与此有关。据台之后,因政治变迁和盟友关系,国民党官方对南京大屠杀“选择性遗忘”。中国大陆方面,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尤其是美方人士作用的认识发生颠覆性变化;此后长时间中,一厢情愿地以“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发动战争的是一小撮日本军阀和军国主义分子”为言说主轴,忽略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本社会的危险倾向,对日本进步力量的反省也置若罔闻,只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中简略提及,以至普通国民几乎遗忘。1980 年代后,随着“教科书事件”的发生,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设、布展为契机,南京大屠杀被“重新发现”。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语境下,认清历史真相以促进中日真正友好成为研究与认知的支点,使南京大屠杀迅速成为中日关系中最显性的因素之一。

1990 年代以后,伴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勃兴,中国国民普遍知晓了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不断挑衅、刺激,各种文献次第发现,受害者和目击者调查的持续开展,案例大量积累,广泛的新闻报道,频繁的纪念活动,全城鸣笛哀悼,等等,相关信息的扩散和再构造,使国民中的受害者意识和“命运共同体”观念得到强化。在学术研究获得长足进展的同时,国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成为与政治、社会紧密互动的思潮性存在,并与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战、强制劳工、无差别轰炸等其他战争遗留问题

交互响应。特定情况下,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进入 21 世纪,中国学界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已经渐渐成熟为一门有着自己概念、范畴、对象、文献体系、学科标准的新的专门史。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中国学界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超越了谴责侵略、追究暴行的一般性的道德评判,而使国民之认知有了新的观照:战争对人性的影响,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大屠杀中相关群体的内部复杂性,战争国际法,战争暴行的比较研究,南京大屠杀在人类共同历史中的地位,与战争加害国民众历史认识的互动,促进其对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思考,战争后遗症的治疗与救平,战后和平的构造,等等,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学术研究与国民认知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现实的可能。

我与张生先生相识已久,对他在历史学学术领域的努力耕耘,特别是他将具有历史哲学深度的思辨方法融入其研究题目的尝试有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本作为专注于史实的新的成果,体现了他多年对南京大屠杀问题深刻的思考。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关心该问题的学者及广大的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慎终追远,实事求是,是本书的宗旨,也是作为历史学者的共同目标。

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写了上面的话,以表达我的感触与心情。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步 平

2011 年 11 月于北京

自序

研究南京大屠杀史，至少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不能也无法回避。其中，宏观、中观和微观，交错呈现，交叉影响：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时，日本军方人士表示，在第三方人士的目击下，完成对敌国首都的占领，在世界史上没有先例。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被占领的南京，确实滞留了二十多名外国人士，他们的国家在中日战争中尚处于中立状态。但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深深地介入其中。他们通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平台组织起来，在国民政府和南京特别市当局西迁的情况下，承担了部分的市政管理职能，从而与南京的日军、日本外交机构、日军扶持的傀儡政权发生交涉，对后者行为形成压力和监督。他们对南京沦陷前后日军行为的观察、记录、分析和传播，使南京大屠杀为时人所知，并成为国际事件。

第二，早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均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设定了持久战战略，并作了相应的部署，南京的沦陷，毋宁说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日军中以松井石根为代表的一些人，却以为占领被视为“抗日堡垒”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可以歼灭中国的有生力量，摧毁中国的抗日意志，使中国“威服”，从而速战速决。双方认知中，对南京的定位，存在重大差异。

第三，占领南京后，日方内部存在一定分歧。日军高层的一些人，抱持“膺惩中国”的想法，支持、放任，或者默许日军官兵的暴行，“屠杀令”的客观存在，显示了他们的犯罪故意；而以日方外交人员为主体的一些人，对战争法规、世界形势认知较为清晰，出于维护日本长远利益的目的，认为暴行有损日本国家和日军的形象，甚至有意让一些西方人士的抗议和对暴行的揭露流传到南京之外，认为这样可以施加压力，迫使日军有所收敛（英国外交人士语）。他们之间的分歧，使得与世隔绝的南京出现小小的缝隙。当然，这一分类不是绝对的，日本外交机构中恶棍与日军官兵沆瀣一气，日军中也存在个案性质的救助中国人行为。

第四，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存在三个基本的人群：西方人士、日方人员、无助的

中国军民。由于西方人士提供人道救助和善意安排,中国人自然地倾向并依赖之;日军暴行使中国人畏惧并疏离,但欲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又必须将中国人置于其管理之下。形成两面三方的博弈局面。国际安全区本是日军默许下运行的临时机构,实力决定博弈的结果:安全区的难民在日军甄别、“安民”、关闭难民所、发粮等威逼利诱的措施下,渐渐解散回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组为“新秩序”下边缘性的慈善救济机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第五,南京大屠杀的高潮期持续了约6个星期,之前的轰炸和围攻,之后不时发生的日军暴行,都给南京居民极大的生存和精神压力,但生活在苦难中还必须继续。迫于战争威胁,南京居民的行为和生活状态呈现出和平时时期罕见的情况:大批年轻女孩仓促间结婚;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迁徙、到周边地区“跑反”和京沪线难民的涌入,改变了南京的人口结构;政府机构、文教科研机构、厂矿企业的搬迁,使得精英、知识阶层几乎完全消失,留在南京的多为贫苦无告的下层民众,甚少有人给予他们战时生活必要的指导,陷入听天由命的随波逐流之中;日军大规模的抢劫,南京被占领后就业渠道十分狭窄,使得居民本就十分脆弱的承受战争压力的经济能力被摧毁,整个地区陷入极端贫困之中;利用一切可得的资源生存下去,成为幸存者压倒性的任务,稀饭是许多人长期的主要食物,情急之下,在日军洗劫商店、住宅后,中国妇孺也有盗窃行为发生。

第六,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可见的、显性的伤害,在事发当时,就被高度关注。暴行案例的积累和显性伤害的展示、宣传,是目击者、记录者的笔下焦点。其实,相对于幸存者在极端恐怖的环境中受到的软性、隐形伤害,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 PTSD(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等心理创伤普遍存在,构成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易被忽视的另一个层面,而且,这种伤害往往伴随受害者终身。与之相伴,社区的破坏,人际关系的变更,个体生活史的颠覆,等等,均处于时人和多数今人视野之外。

第七,战后,两场审判涉及到南京大屠杀,审判的结果,在《旧金山和约》等国际安排中,得到各国政府、包括日本政府的确认,成为讨论南京大屠杀性质和责任的法律基础。两场审判确立的是非意义巨大,是战后日本获得新生的历史起点,但无论是东京审判,还是南京审判,在程序和实体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可议之处,成为日本右翼的攻击要点。中国学界对两场审判的贯通性研究,还在初步状态。

本书绝不敢自称是对上述七个方面问题的精准回答,但表达了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勇气,以及我们继续努力、不断深化对上述问题理解的决心。

我深知,作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尽管我们无意接受学术之外规范的约束,但也不

可避免地受到受教育经历、环境和认知水平的限制,所以,在酝酿、写作本书的漫长过程中,我们注意倾听来自日本的声音,即使是右翼分子的狡辩和否认,我们也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挑战与鞭策,“激励”自己求知求真。

友人们的意见促进了我们的思考。我要特别感谢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座谈中,我曾经提出,那些日本兵,在国内,很多人是孩子的好爸爸、女人的好丈夫、爸妈的好孩子,为什么到了南京,就成为无恶不作的野兽?大江健三郎表示赞成这种思考的路向,同时进一步提出:那些在南京犯下杀人、强奸、抢劫罪行的士兵,回到日本后又切换了身份,很多人重新成为孩子的好爸爸、女人的好丈夫、爸妈的好孩子,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心理转变?战争扭曲人性的机制和过程,至今仍值得深长思索。

朋友们的思考照亮了那些长期被我们忽视的盲区。山田正行教授(大阪教育大学)从日军在云南的性暴行模式出发,指出:日军多采用集体方式施暴,说明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是在敌对的环境中从事犯罪活动,是有组织的战术行为,目的在于从心理上给予中国人彻底打击——对女人身体的占领显示其征服者身份,中国男人则因为无力解救而负疚终生。他认为,日军军纪总体上是严格的,所以,暴行是在上级的命令或暧昧的默许下发生的。他说,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对南京暴行负有责任,战后,他立即取消了“宫”的称号,以此来切断与天皇的联系,防止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实际上,日本政府长期注意不把肮脏的战争罪行与天皇联系到一起,这影响了对战争的反省和认识。

平子友长教授(一桥大学)、渡边宪正教授(关东学院大学)和山科三郎教授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他们提出,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妨碍了他们对自己加害者身份的认知,对于受到其加害的中国人民,理应反省、道歉,给予赔偿。日本政府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和侵略战争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伤害,但同时又不断有人发出否定的声音,这不是真正的反省,因而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彻底谅解。他们进一步提出,不仅要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责任,也要追究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的殖民、侵略“示范”和责任,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战争的起源和责任做深刻的清算,以使人类最终告别战争。这一天的来临虽然遥远,但他们表示,决不能因此放弃这一代人的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朋友们的意见并不是总与我们一致。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早年曾见过毛泽东主席,他对于日军暴行造成的南京人员伤亡有精深的研究,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亦有判明,但他一直用“南京事件”而不是“南京大屠杀”来指称那一段历史。求同存异,在坦诚的学术研究基础上达成共识,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战争意味着对生命的摧残和伤害,侵略战争尤然;战争虽已远去,但厘清责任,才能真正总结教训。战后初期,德国普通民众曾经认为,战时德国的罪恶是希特勒和纳粹“一小撮”的事,与自己无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省的深化,他们意识到,每一个人和千千万万的其他普通百姓一起,也曾不同程度地涉入,负有自己应负的责任。在日本,有无数证据表明,普通民众曾狂热地支持过对华战争。即以“百人斩”为例,绝非个案——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高价购买军刀,送给出征的子弟亲人,支持他们在中国战场上演类似的“勇武传”;天皇的近侍出征中国时,也得到了御赐的军刀。每一个日本国民都负有责任,是很多日本学者的结论,却被我们一些研究者长期忽视。促使日本当局“以史为鉴”,需要我们更为科学和全面的研究。

在南京大屠杀 75 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遇难者,幸存者,以及所有和我们一样期待正义与和平的人们。

张 生

2012 年 1 月于南京

增订版序

2012年清明,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下册)新书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如今又到了清明,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之后的第一个清明。

国家公祭,通过庄严隆重的仪式,把一段历史凝固成了记忆,这记忆,不仅仅是南京人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它是全人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共同记忆——在人类结成相亲相爱的命运共同体之前,他们已经有太多的教训需要记取。国家公祭,是官方公开仪式,其程序包含了许多共识性的意涵,而现代大众传媒的介入,让南京市民、中国国民乃至世界人民获得共时性的认知和体验。

国家公祭每年只在特定的日子里举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屡经扩建,则提供了常态化的公共空间,这一空间自建成之时,便有了自我诉说和表达的能力。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置身其中,他们的主观体验和思考,与空间自身的言说形成互动,从而形成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全景式感受和进入。

可以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及其场境,已经形成无法推拒的巨大政治性、社会性、情感性存在,其感染力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在过去的三年间也取得了进展,其中张宪文教授率领我们完成《南京大屠杀全史》,张连红、孙宅巍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集中了很多优秀研究者的新成果,姜良芹教授和我在《历史研究》相继发表了专题论文。值得注意的是,孙江教授和王楠等人正在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架构新的研究框架,探索新的深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路径。

虽然,曾经喧嚣的日本右翼这几年陷入执拗的沉寂,缺乏有影响的“成果”,国际学术界也已经普遍确认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史次的存在,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显得不像前几年那么“热闹”。然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长为一门严肃学科应有的体征。在突破前的寂静之时,根据新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下册)做出修订,既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

明乎此,我还想沿着列菲伏尔、布迪厄、海德格尔和现代科学的思路再往前走。在我看来,南京大屠杀史,不同于中国历史的其他片段,以其对于中国国民压倒性的巨大影响,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对内对外言说中的突出地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使得时间在其中获得实体性的存在——时间与场境融为一体,或者说,时间成为场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精确时间为标尺的南京大屠杀史从而可以“切成段”、“分成块”,当然也视“引力场”各场域的规模和强度,部分或总体地结合在一起。

历史存在者是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或微观爬梳都是常见的,但都有特定语境和上下文界定的边界。而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宏观和微观超越了“常理”。

就宏观而言,可以是最大的国际性事件通过现代物理学设想的“虫洞”同屏呈现: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对远东局势的判断和态度;日本陆海军的竞争性并进和整个国家在通往世界大战之路上的“暴走”;希特勒在中日间的冷血、“理性”的选择;英帝国面对南京暴行的超常冷漠和反向规劝——它劝西方传教士们不要再收集日军犯罪证据——“那没用”;《真理报》谴责日军暴行、同情中国抗战背后浮现的斯大林剪影;墨索里尼的偏袒性中立——当时那个世界的“治安场”中,没有人真正对南京大屠杀无知。

就微观而言,时间的标尺在历史研究常见的年月日之后,分解到了凌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深夜,甚至小时和分钟。时间细分的结果是时间“变慢了”,拉贝说,“人们觉得自己像个重病人,以恐惧的目光注视着时针走动,觉得它走得太慢了,一天好像有100个小时而不是24小时”,魏特琳说,“时间似乎凝固了”。时间“变慢”,使得我们有条件审视无以数计的历史细节,同时开辟多个观察“窗口”,并把时间赋予它们的特性牢记于心。

1937年12月19日,也许只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通”的一天,举例的缘起,是因为首先看到《东京朝日新闻》守山特派员这天发自南京的电稿:

在住宅区,男孩和女孩爬上坏马车,一边玩一边唱歌。……教堂传来恬静的赞美歌声,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硝烟散去后集中安下心的支那信徒进行祈祷的高潮。今天是星期天啊。……今天在日本大使馆内的广场上,日本兵向难民分发点心和年糕,还将牛奶、罐头送给抱婴儿的母亲。一派亲善光景。

“创作”式报道的潜在真相,是它设定了自己的言说对象(for whom)。但日本记者明确说这一天是星期天,而当时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在

这天的日记体书信中写道：“我猜是星期天。”每天为受害者做好多台手术，他累得迷糊了。这天早上，他和其他外国人去日本大使馆交涉，见了秘书田中，“他自己深表同情，但他无力控制军方”。“回家的路上”，威尔逊发现日军士兵在丹尼尔家抢劫，将他们赶走。然后查房。下午动手术，取出一只眼睛，另做了5个“小手术”。吃晚饭的时候，“柏睿德的厨师和朱先生就进来了，……他们是来喊人去他们那儿阻止日本人强奸他们的女人。”与此同时，看到太平路几个大街区着火了。然后有报告说，日军士兵钻到鼓楼医院护士的床上。

同一天，大批惊恐的妇女和姑娘涌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魏特琳的日记已经具体到小时。上午8点，日本大使馆官员和一个日本人来到学校，因为难民营大米不够了，魏特琳要求他们把她带到安全区总部。见到宋煦伯，宋煦伯答应9点送米过来。回学校路上，很多父母兄弟央求魏特琳收留他们家的年轻女性。然后，魏特琳被一次次叫出来对付日本兵，其中在教工楼538房间，“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下午，魏特琳对来访日军军官讲述日军暴行。晚上，4名日军宪兵来站岗。入夜，看到城里至少三处燃起大火。

时间逐步和事件结合起来，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视角下的南京大屠杀图像清晰起来，自成块状的历史，又像可以拼合的图版。下面是1937年12月19日根据安全区档案被进一步分解、精确到分钟的历史：

上午8:30，美国传教士费吴生的司机李文元一家被日军抢劫，他们家8口人住在珞珈路16号德国人的房子里，门上有纳粹卐字旗，仍被抢7箱衣物、两篓家庭用具、6床羽绒被、3顶蚊帐、吃饭碗碟和50元现金，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下午3:00，日军士兵闯入鼓楼医院，麦克伦和特里默要求其离开时，他朝他们开了枪，幸亏打偏。

下午3:30，一些喝醉的日军士兵闯入红卍字会（按：当时中国的一个民间慈善组织）主席陶锡三（按：后出任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主席）位于莫干路2号的住宅，撬开其箱子，史迈士和施佩林制止了“这场很可能是有预谋的抢劫”。

下午4:45，贝德士被喊去平仓巷16号，日军洗劫了房子，纵火将其彻底烧塌。

下午5时许，一个年轻男子被送到安全区总部，他被日军无缘无故刺伤胸部。费吴生和史迈士前往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暴行，并将该男子带到鼓楼医院。

下午6:00，6名日军士兵摸黑爬入拉贝先生住宅，拉贝用手电照射一名士兵时，此人用手枪对准他。拉贝喝令6人从原路爬出去，他们要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走出去，“拉贝拒绝给他们这个面子”。

下午6:00，安全区一个职员来喊贝德士、费吴生和史迈士去汉口路19号，驱赶房

子里面正在强奸妇女的4名日军士兵。士兵被赶走后,妇女和儿童被转移到金陵大学主楼。

.....

每一个时点的事件,都蕴藏着众多的信息,值得研究者(已经携带着众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先在性”知识、见识和信息,并被其形塑)仔细解读和分析。时间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实体化”,加上场境的细化和具体,使得南京大屠杀本身在经过几十年的今天,仍然可以感性地触摸到,它有“历史的温度”——加害者日军,在每个犯罪现场的“到场”,令当时德国人士指控的“兽性机器”具象化到恐怖地“生动”,无数芸芸众生的日军官兵在命令之下的蓄意犯罪已被解释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实际上其犯罪手段的花样翻新和突破人类底线,早已体现“邪恶想象力”无远弗届的“创造性”;受害者国人,生命在每一分钟里的被蹂躏和消逝,让时间成为了暴力的“同谋”——1949年后,南京大屠杀被长期遗忘,时间成为另一种“暴力”;中立者西方人士,当时就是南京大屠杀“时间—场境综合体”的现场目击者、记录者和参与者,今天更成为研究者进入南京大屠杀场境、跨越历史和现实的接引使者。南京大屠杀史,有自己的研究概念和范畴,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路径依赖也有自己的“范式”,正是其与时间实体融合、获得“更高”维度的体现。

时间已经“开始”,空间已经“觉醒”,非欧几里得时空综合体中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不可能仍然“平滑”,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次增订工作量巨大,具有内在逻辑的内容的补充、丰富自不待言,注释的重置尤费心力,增加了大量的外文原始出处,以便有兴趣者追踪研究。尽管预先声明有乞求免责的嫌疑,但确实,增订本还远远没有完全体现著作者的新思虑,也没有揭橥其他研究者的精研妙思可能打开的广阔天地,所以,本书还只是阶段性的成果,恳请指正。

张 生

2015年清明